

序跋精粹

梦醒时分,我感觉自己的眼角是湿润的,不敢抬头离枕,怕丢失了那个梦。梦中,我家那个小园子的篱笆被暴雨冲散了,满地的花草、攀藤的瓜果一片狼藉。心痛的感觉,明知是梦,还是延续了长时间。在梦昭示给我的潜意识中,儿时的大院,是我出发的起点,给我烙下一生难以涂改的身身。

一个朋友看了我写过的一篇文章后,告诉我一件往事。当年,她初次踏入男朋友的家,男母亲问她一句:“你家住大杨浦还是小杨浦?”她顿时窘迫到脸红,怯怯地反问:“什么是大杨浦,什么是小杨浦?”外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,这一问一答间包含了多少攻守进退和上海的区域文化差异。其实,直到今天,我也不知什么是大杨浦什么是小杨浦。但这家女主人提问的方式和语气,显然已经在表露她对女孩子家庭出身的不满,一种上只角居民对下只角居民居高临下的优越感,女孩子即使没被她吓退,至少在气势上已经成为她的手下败将了。后来她们也确实没有婆媳的缘分,但这个问题一直是女孩心底的一小片阴影,直到她有一天真正强大了,才当作笑谈与我分享。

生活在军工路,当年已是市区最边缘了。我们并未觉得有什么缺失。我的多数二院小朋友,父母都来自全国各地,很少去市中心,难得出去便说:“到上海去!”而我们家,因为每月要去探望四位老人,所以对于上海中心城区的文化并不陌生。中午在外婆或奶奶家吃好午饭,父亲通常就坐不住了,要去同学或朋友家串门,通常又喜欢带着我。于是,我跟着父亲去静安新邨他的同学家。有时又去父亲另一位同学的父母家,长江公寓——很多年以后才知道,当时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还住在那里,而张爱玲也曾住过301室。上海人家的规矩,有孩子来作客,不能干坐着的,有时是一块放在碟子里的简砖(简易包装的冰淇淋),有时是一碗馄饨。长江公寓的柳家阿婆一般拿只钢宗钹子到黄河路上买生煎给我吃,我坐在她家窗边,能看到她在马路对过楼下排队的

我从东区来

许云倩

身影。不吃东西的时候,我很安静地听大人说话。说的都是些有别于我们家大院平时的话题,尽是些奇奇怪怪的事。有一家人家,大概是父亲的朋友,男主人喜欢玩电影胶片和放映机。在他家看过小电影,是个新闻纪录片,庄则栋率团访问哪个国家。外婆家在三角地菜场附近,有时会听说些弄堂里的家长里短,但因人小,一点也没兴趣。倒是暑假常住奶奶家,奶奶家在杨浦区比较热闹的地方,邻里间故事多些,有一次不知为何,隔壁弄堂的一个姑娘跳井了;没事时,邻居家婆婆数落媳妇了;种不是,让女孩说受到了上海的市民文化。但总还是一个旁观者,隔着一层间离的薄纱。

屈指数来,我搬离沪东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住在那里的时间,但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年少时早已铸成。记得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,我和两个同事在办公室给几个年轻人介绍对象。女孩是我父亲单位的助教,男孩有好几个,有的是单身的,有的是在一起玩的,尽量不想搞成一个俗气的相亲,只当作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。后来女孩说她比较中意在媒体工作的一个朋友,他们也有过一次约会,随后就不了了之了。我听男方说,因为女孩有出国打算,而他没,就此别过。我和父亲谈起此事时,说起其中另一个复旦子弟倒是全家除他之外都出国了,他肯定迟早也要出国的。父亲有次告诉了助教,助教责怪道,你们为什么早不告诉我?我诧异,她也太直白了,找寻另一半不是该看两人是否有共同的生活理念和共同语言吗?怎么以能否出国作为唯一的前提呢?虽然当时出国似乎是一件让人非常骄傲的事情。

中年之后,我写过一篇文章,对于中心城区的市俗标准、市井文化多了几份理解,我的那个杨浦的朋友,背负了多年大杨浦小杨浦之阴影!今天我,对我说,终于跟自己和解了!那么我想说,我和上海主流的西区文化也和解了,但那层薄纱依然还在。喝杨树浦自来水厂的水长大的人,身上终是带着东区的泥土气和青草味。

(本文为许云倩散文集《东区故事》后记)

“王!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

——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

全书开头,载孟子谒见梁惠王。梁惠王说:老先生,您不辞长途辛劳前来,将会给我的国家带来很大利益吧?孟子回答的第一句话即如上所引:大王!为什么一开口就说利益,只要有仁义就行了。

紧接着,孟子精辟地分析了不讲仁义只言利之害:君主只想怎样才对我的国家有利,大夫只想怎样才对我的封邑有利,士人和平民只想怎样才对我的生活有利;这样,上上下下互相追逐利益,国家就陷入危险了。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,杀掉国君的,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。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,杀掉国君的,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。在一个大国里有一千辆兵车,在一个中等国家里有一百辆兵车,不能不说已经很多。但是,如果把道义扔在一边,而重视利益,那么不夺取更大利益是不会满足的。没有讲仁德的人会遗弃父母的,没有讲道义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的。大王您只要讲仁义就行了,为什么要说利益呢?

“何必曰利”

白子超

孟子以仁政为原则,所以要求国君保民、安民、富民、教民,而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。延续了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,君主嘴里的国家利益其实就是他们的个人利益,因为他们的意识或潜意识里,都是“家天下”和“朕即国家”。也就是说,他们等同于说一不二的大家长。梁惠王“亦将有以利吾国乎”一出口,孟子马上本能地感到了梁惠王的私心、私欲,而义正辞严地提出了仁义与利益之别。



孟子选读

司马迁说:“余读孟轲书,至梁惠王问‘何以利吾国’,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:嗟乎!利,诚乱之始也。夫子罕言利者,常防其原也。故曰‘放于利而行,多怨’。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,何以异哉?”(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)“子罕言利”,在《论语》子罕篇,“放于利而行,多怨”在里仁篇。孔子很少谈利益问题,反对放纵地追求利益,认为那是“怨”的根源。司马迁对“原”

有所发挥,指“乱”,关系到国家的根本。而孟子用的是“危”。

然而,不难理解,孟子的话有很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。仁义也好,利益也罢。都有明确的指向。如果梁惠王不说“利吾国”,而说“利吾民”,那么孟子的话大概就是另一番模样了。就是说,讲民众利益,孟子不仅不会反对,而且会大加赞扬。前文“制民之产”“勿夺其时”“薄其税敛”,孟子说的不正是为民谋利吗?因此,倘若上升到学理层面,不能说孟子只取仁义而去利。而从汉代董仲舒开始,便曲解了孟子的话,认为孟子只要仁义不要利。两千年来,绝大多数儒生讳言利,乃至不分合义之利与不义之利、公利与私利、民众之利与统治者之利,实在是偏颇的。从战国时期开始的义利之辩,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题目,如今已有全新的认识。甚至可能已经矫正过正,太强调利益了。

一切均以利益权衡为准绳,那岂非一个利欲熏心的世界?当政治家们、企业家们以及形形色色的人们,抛去仁爱之道义,一味大讲特讲自己的“利益最大化”时,“怨”“乱”“危”已经相伴而来!

近见本报刊载翁思再先生的“上海评弹”称谓并不准确)一文,由此想起了上海评弹界一位异数人物,那就是在书坛上用上海话开讲历史故事的评话前辈杨乐郎。

沪语评话杨乐郎

江更生

1956年笔者读高中一年级时,曾在上海西藏中路中百一店对面对面的新成书场听过他的评话《列国》,同时献艺的另外三档为:朱小祥、李娟珍的《啼笑因缘》、金声伯的《七侠五义》和金月庵、金凤娟兄妹的《玉蜻蜓》。杨乐郎用一口流畅的沪语说书,起先让我感到诧异:怎么不用苏白,后来便越听越入神,忘记了方言的迥

异。他的说表清脱,不时地穿讲文史知识,所放的噱头贴近生活,犹如相声中的“抓现眼”,甚解人颐,听的人并不觉得他在以苏州话为主的书坛上用

身广播界,当时上海私人电台众多,杨乐郎的一档节目叫《杨乐郎空谈》,“空谈”二字一语双关,既有空中电波谈话节目之意,又有“说了也白说”的调侃味道。他在播音时借故事发泄对社会的愤懑,鞭挞世风日下、人心不古等,活像半个多世纪后才出现的“海派清口”,排起辈分来,他该是周立波的先贤呢。他还写过4集《洋泾浜猎奇录》,这是纯用沪语写作的杂文集子,作者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两个代词“子码”与“牌头”代替男士女郎,由于内容嘻笑怒骂,个别词语有“咸涩”之嫌,解放后曾一度被禁,据现今观念衡之,似也无甚大碍,笔者曾在上海旧书店觅得一本。

上海解放后,私人电台取缔,杨乐郎便由上海故事改进协会会员身份转入上海评弹改进协会。据说,起先曾因他不会苏州话但用沪语开讲而遭拒。他引经据典,据理力争,陈述“评话”并非苏州一家独有,操各地方言均等地皆有评话,说评话的祖师爷柳麻子(敬亭)就不用苏白说书,在海纳百川的春申,沪语评话理应有一席之地云云,最终被允入会。后以《吴越春秋》



书法 王朝阳

静安诗草

菩提达摩 朱培正(美国)

面壁高山传慧种,七宗共祖益千年。云门一字经文简,临济双关法法玄。秋月江中寰宇小,春花蕊上大千全。众生普渡勤耕作,得失无心即是禅。

偶忆 张永东

虚掷华年五十春,鬓龄欢乐最天真。蛙鸣遍野繁星夜,林雾弥川旭日晨。滚滚铁环飞蹊路,淙淙山涧戏游鳞。无忧岁月换残梦,将伴斜阳入暗尘。

断碑 徐炜

没草残垣落晚晖,前贤意气久相违。曾随凿凿明今古,岂为汹汹易是非。幸有荒苔存半字,断无完璧立千围。初升又是当时月,独向人间说去归。

少年时读《三国演义》,见诸葛亮以三寸不烂之舌战胜了许多儒生,大感快意。这些儒生都才高八斗,没一盏是省油的灯,他们轮番向孔明激烈发难,可是只有张昭还对抗了几句,其余的基本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。

应该说,诸葛先生是有幸的,他舌战的对象是知书达理的儒生,他们都有君子之风。这些儒生的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,联蜀抗魏确实要冒极大风险的,但他们毕竟是讲理的儒生,虽然只交锋了一个回合,便自愧不如,知趣地默默退下。相反孔明倒有些欠厚道,与陆绩辩论时,他说实质问题前先坏笑着调侃:“公非袁术座间怀桔之陆郎乎?”原来陆绩幼时曾在袁术处偷了三个桔子,想孝敬母亲的,没想到这么多年后给揪住了小辫子。好比跟人辩论,开口就问:“哈!您不是当年在幼儿园里偷了小朋友棒棒糖的阿三头吗?”不等切入正题,对方就气馁了。其实,陆绩很可以自己的孝心辩解,他怀桔的事迹后来是上了《二十四孝》的。

难道君子都出在古代?遂又揣想:东吴也未必集中了那么多君子,如果诸葛亮碰上的不是自重身份的儒生,而是死缠烂打的泼皮无赖的角色,他手中又无有杨志的宝刀,那回书该怎么写呢?我现在坚决相信,那“舌战群儒”的精彩场面只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,目的是突出诸葛亮的大智慧,诱惑我当年那样的懵懂少年读着大呼过瘾。

走下公交车,迎着朝阳,吹着暖风,我径自走在进村的小路上。乘坐三站南堡专线,然后步行15分钟到井亭村村委会,这就是我每天工作的开始。

每每走在村路上,都能远远地看到飘扬在村委会上空的五星红旗,那熠熠生辉的旗帜就像灯塔般始终指引我方向。

我是一名年轻党员,201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还是一名在读大三学生。由于热心团工作,我在入学第一年就光荣地被推荐为入党积极分子,并参加了党校学习培训。然而,我虽从党校顺利毕业,却因当年个人学习成绩没有达到要求,被延期发展了。

这件事一直让我很苦恼,辅导员的一席话点醒了我。他说:

“虽然很可惜,对你来说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,也是党组织对你的一次考验。你要明白学习是一个学生的本职,不能本末倒置。学习是一个人一生的事,更是一名党员毕生坚持的事业。学习得以立本,锻炼得以成才。”从那时起,我开始深刻反思,并慢慢学会在学习与工作中平衡,每天学生工作再忙也要抽出2个小时待在图书馆或自习室看书。终于,我获得了二等奖学金,还被发展为预备党员,并在那一年获得了年度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干部的荣誉称号。而后经历了一年的预备期,我也顺利转为一名

正式党员。

如今,我是一名在农村服务了2年的大学生村官。我的组织关系转入到了村党支部,我也随之加入第四党小组开展组织学习生活。我的身边有许多经验丰富、思想纯正的老党员,从他们身上,我看到了浓浓的爱国爱党情怀和坚定的拥护国家拥护党的信念,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一名党员的职责与担当。我不断努力提高政治理论修养,修正自己思想认识偏差的地方,并时刻鞭策自己,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树立科学正确的三观,并以此为指导应用在学习

学习是一生的事

洪日

工作生活的实践中,不断提高,不断进步。

“我是一名党员,更应献至诚。个人太渺小,党群才万能。念我数十年,庸碌愧声闻。今后几时期,正路在遵循。”这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陈毅同志在其《六十三岁生日述怀》的诗中说的,何况我乎?

眼前的红旗还在风中飘扬,太阳已慢慢挣脱山的怀抱。我告诉自己,这就是我来农村的理由,这就是我一个年轻党员选择来到基层的意念与执着——在基层锻炼,为人民服务。

人的精神境界是自我追求和锻炼的结果。

十日谈

在党旗下成长

为蓝本,自编《列国》蜚声三尺书台,也算是一位独树一帜的评话演员了。

杨乐郎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即匿迹书坛,直到1979年以后才重返艺苑。当时,他加入了属原南市文化局代管的“南风曲艺团”和“春江沪书团”,仍以沪语评话《列国》《十五贯》等款款聆听。因其故事娓娓动听,噱头时尚蕴藉,甚受听众追捧。他在原黄浦文化馆屋顶花园开书,几乎场场爆满,在无锡等地也都是每场座无虚席,台下更有不少曲艺界同行,专门闻讯前来聆听取经,学他穿插的大小“扑落”(英语电器插头之音译,滑稽界术语,指大小“噱头”、“包袱”)。于此,也可见其书艺精湛之一斑了。

印坛巨匠陈巨来先生,是位超级评弹迷,见晚年的杨乐郎历尽坎坷、身患肺病,说书困难,于是向有关部门陈情,并力荐他进入上海文史研究馆。杨乐郎终于在1982年1月受聘入馆,成为以评话演员身份兼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的第一人。



夜光杯